

葛懋春

史论集

山东大学出版社

鲁新登字09号

责任编辑：申海田

史 论 集

葛懋春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0印张 260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册

ISBN7-5607-0522-7/K·50

定价：4.50元

作者简介

葛懋春，安徽合肥人，1926年2月生。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山东大学历史系讲师、历史系主任等职。现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系系务委员会主任，华东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哲学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著有《历史科学概论》、《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书。

自序

这是我大学毕业后，40年间的论文集，这些论文，约分三组，史学理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文章半是史学、半是理论，名之为《史论集》。

我研究历史是半路出家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由于仰慕青岛海边风光，便放弃去我的老家安徽大学上学，而到当时只有海上交通的青岛山东大学外文系就读。开学后不久，我随即参加当时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跟着一些同学组织历史研究会，学习中国历史，学习当时能搜集到的马克思主义名著。在外文系读一、二年级时，英文成绩，虽稍有长进，但我内心却渴求着充实新知识。于是教我哲学课的赵纪彬教授开始了对我的启蒙教育。1948年暑假期间，国民党政府，组织特别刑事法庭，审判参加学运的学生，我被迫离校南去南京、上海、台湾等地流亡。1949年春节后，我由台湾返上海，一直等到上海解放后，我才北上青岛山大复学。解放后的山大，欣欣向荣，在华岗、杨向奎、赵纪彬等教授主持下成立了历史系、历史语文研究所、文史哲杂志社，开始招收校内各系转入历史系的学生，我于是转入历史系三年级学习。解放初历史系同学主要听华岗等教授讲授马列主义哲学、中国历史等课外，还下乡深入农村，参加当时山东土改运动。1950年冬，我参加了山东昌潍专区土改工作组，先后参加了潍县和安丘两县的基层土改工作，负责土地调查，这是一次很好的实际学习机会。土改结束返校后，我立即整理土地调查资料，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从昌潍土改工作看封建剥削》。后经赵俪生教授推荐，刊载在《文史哲》第1卷第3期上。这是我大学学习生活的结束，也是我学习写作的起点。1951年大学毕业后，我留校

担任《文史哲》杂志编委会常务编委兼秘书工作约六年，我除编辑文史哲杂志工作外，还讲授哲学、马列主义名著选等课。1953年我应华东人民出版社之约，编写了《基础和上层建筑》，三年之内，出版了10万册以上，这对当时宣传唯物史观起了促进作用。1957年夏，我下放青岛郊区农村劳动锻炼约一年半后，被调回济南山大历史系，接着被派往枣庄煤矿，主持编写《枣庄煤矿史》，该书于1959年出版，其中第二章第一节《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的建立和发展（1899～1937年）》就是这时在《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和我参加土改的文章对我思想触动很大，特收入此书以志纪念。1959年秋我被派送北京大学哲学系，随冯友兰教授学习《中国哲学史》，我们大约每周在冯先生家开会，边讨论，边请教。当时山东大学正筹办召开孔子讨论会，我于是将在北大讨论会上的中心发言《试论孔子天道观》一文寄给山大讨论会，表示参加。1960年秋天我从北京大学返校，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现代思想史以及史学理论。文革前，我陆续发表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文，并且和庞朴同志合作以鲁春龙笔名撰写的几篇史学方法论文章，收入本书的有两篇，即《试论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原则》、《怎样理解“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同时，为讲授课程我们开始编辑《历史科学概论大纲》，这是我在文革后重新主持编写《历史科学概论》一书的基础。文革后我除了主要编书外，还写了五篇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论文，全部收入本书。以上就是我40年来在山大从事教学、科研、写作的经历。我的文章多数是仓卒之作，从中选出若干篇结集，错漏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一九九〇年七月廿一日于济南

目 录

自序

怎样运用阶级斗争观点 研究历史	1
论史论结合中的几个问题	16
试论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原则	27
怎样理解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	46
思想遗产批判继承讨论述评	60
学习恩格斯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	70
上层建筑改变条件及其规律的几点商讨	78
试论孔子天道观	97
孔子认识论评价中的一个问题	110
《非儒》篇为墨子遗教说质疑	123
商鞅法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132
商鞅变法是怎样强化地主对农民统治的？	144
秦惠王历史作用再评价	156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	164
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问题论战	195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论战	230
从昌黎土改工作看封建剥削	256
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的建立和发展（1899～1937年）	270
附：一、葛懋春教授教学科研工作简介	304
二、葛懋春主要学术论著目录	307

怎样运用阶级斗争观点 研究历史

最近一个时期，史学界和理论界都展开了有关阶级斗争问题的讨论。有的同志认为，阶级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是生产方式的改变；有的同志认为是阶级斗争。其实，这两个论断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把生产的发展同阶级关系变化的本质联系加以论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贡献。

阶级斗争在近代社会中的作用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前人这方面已有的科学成果，把它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并用以说明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本文着重说明经典作家在这方面的新贡献，以及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

自从原始社会瓦解以后，全部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

阶级和阶级斗争事实，早已为近代历史学家所承认。自从采用大工业时起，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有了明显的增长。在先进的英、法资本主义国家里，占有土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夺取统治权的斗争，以及在1830年以后无产阶级参与争夺统治权斗争的事实已经愈来愈明显，因而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阶级斗争是推动近代历史发展的动力。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复辟时期历史学家们都指出过阶级斗争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

圣西门早就讲过“有产者”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并以阶级斗争去解释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他甚至把新的工业制度和旧的封建制度，看作是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进行斗争的经济基础。

圣西门的历史观点几乎全部为其义子奥古斯丹·梯叶里所继承。作为自觉捍卫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学家，梯叶里明确地提出要写除掉贵族和僧侣以外的全体人民的历史。他认为编写那些同贵族进行斗争过的农奴、纳税者、有产者儿女的历史，即市民和庶人的历史，比起书写高贵人们和国王的历史更有意义。他把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史，直接解释为第三等级反对贵族斗争的历史。

与梯叶里同时代的米涅同样认为：阶级利益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他清楚地意识到法国革命中不同政党的斗争只是不同阶级利益的反映。

法国历史家基佐更是把社会关系、各阶级间关系看作是政治关系的基础。他指出：要了解政治制度，就必须研究这个社会中各阶层及其相互关系，而要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就应当理解土地关系的性质^①。

但是资产阶级学者却没有科学地说明阶级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他们的阶级斗争理论归根到底还是唯心的，梯叶里用征服来解释阶级、等级的起源，基佐则借助人性来说明财产关系等等，都暴露出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批判继承了前人阶级斗争的理论，把阶级斗争观点奠定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用生产的发展来解释阶级的起源和阶级关系的变化。马克思在总结阶级斗争学说发展的历史时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

^①普列汉诺夫：《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三联书店，1965年版，39页。

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一）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般历史阶段相联系；（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它认为阶级的产生、发展、灭亡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决定着不同的阶级结构。阶级是个历史现象，是在原始社会末期才产生的。原始社会人们只能用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之类简单的生产工具，联合起来用集体力量去同自然界及猛兽作斗争。在公共劳动基础上形成的只能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公有制。那时社会既没有可供剥削的剩余产品，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剥削和阶级。

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人们使用金属工具，出现了畜牧业、农业、手工业以及这些生产部门彼此间的分工；此时已有可能在各个人之间、各个部落间交换剩余产品，因而氏族内部的氏族族长、酋长、军事首领、祭司以及其他担任公职的人员，就有可能利用自己的职务方便，攫取特权，侵占一部分公共财产，并利用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的机会发财致富。同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能提供日益增多的剩余产品，因而吸收新的劳动力作为剥削对象已经是有利可图的事了，一度被杀掉的战俘，就逐渐被用作剥削的对象，随着社会财产不平等现象的发展，氏族、部落内部穷人和富人的不断分化，于是穷人也逐渐沦为奴隶。从此，人类就由无阶级社会向第一个阶级对抗社会——奴隶制社会过渡。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的斗争是奴隶社会阶级斗争的基本特征。可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见，阶级的出现，奴隶社会的阶级构成，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从而也决定着剥削制度、阶级结构的变化。代替奴隶制的封建制，以及代替封建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归根结底都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①不仅如此，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还为最后消灭阶级创造了物质基础。总之，根据生产力的不同水平，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来考察阶级的产生，阶级结构的变化和阶级的最后消灭，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学说的一个根本区别。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不敢承认阶级存在，特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只跟生产发展的特殊阶段有关；他们从来也没有认识到生产力发展水平，最终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着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以至阶级的消灭。他们只是从歌颂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斗争，肯定某一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事实罢了。同时，他们也不敢正视并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矛盾，以及这一矛盾基础上产生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后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从而为消灭阶级、埋葬剥削制度创造了经济、政治、思想条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阶级立场，使他们并非偶然地否认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统治、剥削制度的历史暂时性。只有把建立共产主义，消灭一切阶级，解放全人类看作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把历史辩证法和阶级斗争学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生产的发展来解释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

恩格斯在概括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中心思想时曾经指出：“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①。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把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统一地看作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和动力。我们既不能离开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具体状况，孤立地、非历史地、无限夸张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但是，在纠正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观点时也不能抹杀阶级社会历史的大量事实，否定阶级斗争的重大历史作用。

二、在史学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几个问题

在史学领域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首先必须重视研究历史上阶级和阶级斗争赖以存在的经济关系，揭露隐藏在政治思想斗争背后的，而最终起着决定作用的阶级的物质利益，把经济史研究摆在重要地位。

阶级本身是个经济范畴，阶级就是指那些与特定的生产关系、剥削制度相联系的，在经济上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列宁在概括阶级的本质时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②他明确认为阶级是由经济关系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6页。

②《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2—383页。

中“四个不同”，特别是由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所决定的。“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历史时，总是着重揭露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经济关系；研究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阶级斗争规律，指出各个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归根到底是由于各个阶级不同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经典著作，都是着重从经济上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的。恩格斯在批判唯心史观时指出：“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②

应该肯定，由于解放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投入对唯心史观的批判，因而他们比较重视运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来探讨社会经济史中的有关问题。五十年代初期史学界关于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的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都说明了这一点。一九五八年以后，由于理论界片面夸大政治等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于是史学论坛上出现了离开阶级斗争据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片面地大讲特讲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因素的决定作用。事情正象恩格斯指出过的那样，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都只是在大谈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时，当作从属的因素顺便提到过。1890年恩格斯在论及历史科学的任务时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

①《列宁全集》第6卷，第23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页。

点。”他批评德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①恩格斯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研究各部门经济史，然后才有可能对政治等思想观点作出科学的说明。列宁在阐述俄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理论工作方向时，同样强调“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及其一贯的发展，凡是这种对抗为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传统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加以揭露。这个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来给以完备的说明，应表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并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②如果说，一九五八年以后，我国史学界一度对经济史研究有所忽视的话，那末，在林彪、“四人帮”统治时期，就更谈不上任何历史科学的研究了。他们根据篡党夺权的需要，炮制反革命影射史学，大肆叫嚷要以儒法斗争为基本线索来改编历史，他们不但抹煞儒法斗争的特定的经济的、阶级的内容，而且公开把儒法两家思想斗争看作是全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猖狂挑战，是他们唯心史观的大暴露。无论从清算林彪、“四人帮”唯心史观谬论，或从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着眼，都有必要重新强调把阶级斗争和特定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的研究，把社会经济史研究提高到更重要地位。

在史学研究中坚持阶级分析方法，还要求我们具体地分析阶级和阶级斗争特殊性。

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既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有着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从而形成了各阶级的特殊利益，特殊的思想习惯，心理气派等等。各阶级成员对于社会历史上重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2—433页。

②《列宁全集》第1卷，第274页。

大事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处理方针。统治阶级总是要制定一套维护他们利益的法律和制度，组织一定的机构并扶持那些为他们存在而辩护的各种意识形态。而被统治阶级在长期斗争实践中，也逐渐形成保卫自己利益的组织等等。在阶级社会中，不仅人们的言行，而且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观点、制度，都体现一定阶级的要求。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按照阶级社会本来的样子去考察历史现象，必然要求我们学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从纷繁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揭示出它所体现的特殊阶级的利益；学会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考察历史人物言行的性质，分析历史事件的社会意义，估计它的阶级作用。列宁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①

研究阶级社会历史应该具体分析各个社会的阶级构成、社会的基本阶级矛盾，分析这个基本阶级矛盾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找出矛盾双方在具体斗争中的关系。同时，还要在同一社会的各种矛盾中全力抓住主要矛盾，分清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等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研究阶级社会各个阶级代表人物言行，或各阶级所发动的重大事件时，重要的是要具体分析什么样的具体阶级背景、利益、动机促使人物、事件的出现。在这方面不能简单地用一般的阶级性的套语来代替。而是，要求我们充分估计到阶级斗争现象的复杂性，防止公式化、简单化。历史研究中的唯成分论，应该说是这种错误倾向的重要表现。

对于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及其代表人物进行阶级分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4页。

析，主要是从当时当地的阶级斗争具体事实出发，考察某种政治思潮及其代表人物活动对哪个阶级有利，指出它们的阶级作用。列宁说：“要是一下子看不出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议、措施等等辩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①我们在研究某些思想家、政治家言行时，当然要估计到他们个人出身、家庭条件对他们言行的影响，但是决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用个人出身、成份来解释他一生的言行。因为个人出身、成份对一个思想家、政治家的影响，决不是千篇一律的，在不同人身上会具有很不同的情况。同样出身、成份的人，甚至兄弟之间，都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政治倾向。用填表格的公式说某某人因为他出身劳动人民，于是他的思想必然进步、世界观必然唯物、辩证等等，都是不符合事实的。例如，我们对孔子思想进行阶级分析，主要是把孔子思想体系放在当时鲁国、春秋末年整个阶级斗争背景下考察，看看孔子活动时代的主要阶级矛盾是什么，决定当时社会进步的主要阶级力量是什么，阶级斗争中基本政治问题是什么，孔子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的，他的这些回答所构成的思想体系总的倾向，到底对哪个阶级有利，这些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等等。至于孔子父母是谁，他的个人出身成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言行，当然是可以研究的。不过，如果认为通过考证，肯定孔子出身于平民，不是贵族，然后就下结论说“他的革命性正由他的阶级成份上来”，显然是把阶级分析简单化了。孔子是否是平民还是一个未决问题。姑且算他是平民成份，那也只是问题的开始，还必须进一步阐明他的阶级出身、家庭政治地位、经济条件、父亲教育等等对孔子世界观形成的具体影响，而不能根据他的平民出身，就推论出他一定革命。因为平民成份的人，有革命的和不革命的。要说明某某人为什么革命，单讲他成份并不能回答；为什么同样成份，会有根本

^①《列宁全集》第19卷，第33页。

不同的政治倾向？如果有人认为考订出孔子成份，就算是解决了孔子思想的阶级性问题，那不是出于丑化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也是不顾历史事实的臆断。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按其个人出身，都不是无产阶级，马克思的父亲是律师，恩格斯的父亲是资本家，列宁的父亲是一省的教育总督，他们出身并非工人，但却是举世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说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人物，是就他们所发现、所论证的思想体系，以及他们的实践活动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根本不是依据他们个人出身、成份来判定的。那么为什么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人，能够参加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呢？马克思、恩格斯依据阶级斗争规律对这类绝非是个别的偶然现象，作出了科学回答：“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个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知识。”“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象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①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以其知识为一定阶级服务，并分别属于不同阶级的。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及其行为的阶级属性，主要看其言行的总倾向对哪个阶级有利，为哪个阶级服务。他的言行体现的阶级要求，同他的个人阶级出身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甚至根本相反。以阶级出身来判断历史上思想家、政治家言行的阶级性，实际上是按照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公式来剪裁历史，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当作套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页。

语。

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要求我们对剥削阶级作用进行全面估价，不能以阶级义愤去代替科学的研究。

要对历史上剥削阶级作出评价，首先就遇到评价阶级活动的基本标准问题。过去史学界有人认为：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就是评论历史上各阶级作用的基本标准。凡属剥削阶级，统治过劳动人民的帝王将相，既然都无例外地压榨过劳动人民，为争夺统治权进行不断的斗争，从而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因此应该予以全盘否定，甚至在历史书上可以一笔勾销他们的名字。

对于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劳动人民的苦难，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当然不能无动于衷，抱着客观主义的态度，而应深入地研究，揭露产生它的历史根源，阐明剥削形式变化及其最后灭亡的规律性，考察剥削阶级活动同劳动人民的关系，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等等。但不能简单地以剥削作为判定剥削阶级历史作用的基本标准，不加区别地对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全盘否定。

对历史上剥削阶级作用进行实事求是地估计，重要的是遵循马克思的教导，根据阶级的存在只跟生产发展的一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理论，去分析一定阶级的活动的经济根源，考察它们言行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实际作用。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政党是一定阶级的代表，评价政党政策及其实践的标准，完全可以用来评论历史上各阶级的历史作用。判断历史上各阶级功过的标志不是剥削与否，而是要看它们对当时生产力起什么作用，是促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